

从汉语的重音谈语言的共性与特性

端木三

美国密西根大学

语言有共性，也有特性。可是共性多还是特性多，看法很不一样。有人认为共性是主要的，所以着重找语言的普遍规律。有人认为个性是主要的，所以着重找不同语言的特殊现象。下面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同语言差别很大，可是经过仔细分析以后，往往会发现语言的共性不仅超过最初的想象，而且还能解释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先从汉语的双音节问题说起。汉语基本上是单音节语言，可是也有很多双音节词。双音节词又分两种。一种只有双音节，没有单音节。这类大多数是新词，后面再谈。另一种双音节词同时有个单音节形式，两者基本同义。请看下面的例子

- (1) 单： 煤 蒜 店 种 学
双： 煤碳 大蒜 商店 种植 学习

这类词多数是先有单音节后有双音节，也有先有双音节后有单音节的。这个现象不少人注意到过。一般认为，从单音节到双音节，是由于汉语音节太少，以致同音字太多。使用双音节词可以避免歧义。从双音节到单音节呢，也许是因为在没有歧义时，可以省掉一个字。这种说法听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下面还会讨论）。可是有些问题并不能由此解释。请看下面的例子

- (2) a. 种植大蒜
b. * 种植蒜
c. 种大蒜
d. 种蒜 (* 表示不好的结构)

如果一个词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两个形式，两个词放在一起应该有四种可能：[2 2]，[2 1]，[1 2] 和 [1 1]，分别列于(2a-d)。可是 [2 1] 并不好。如果使用双音节词是为了区别歧义，很难解释为什么 (2b) 不好。也许是节奏问题？我们知道两字一组节奏最好。[2 1] 当然不太好。可是 [1 2] 为什么又可以呢？

再看下面的例子

- (3) a. 煤碳商店
b. 煤碳店
c. * 煤商店
d. 煤店

[2 2] 和 [1 1] 仍然没什么问题。可 [2 1] 却可以了，

而 [1 2] 却 不行了.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2) 和 (3) 所体现的不是个别现象. 总的说, [2 2] 和 [1 1] 一般都比较好. [2 1] 和 [1 2] 好不好要看句法结构. 动宾结构中, [1 2] 比 [2 1] 好. 不带“的”的偏正结构中, [2 1] 比 [1 2] 好. 这个现象已经有人注意到过 (如, 吕叔湘 1963, 陆丙甫 1989). 当然不是说没有例外. 比如, “鬼故事”和“研究鬼”都可以说. “鬼故事”是偏正又是 [1 2], “研究鬼”是动宾又是 [2 1]. 但这种例外也许另有原因. “鬼”没有双音节形式, “故事”和“研究”也没有单音节形式. 所以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只有一种方式, 没有选择, 合不合节奏都只好用它.

还有两个现象也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 一个是当名词的修饰语带“的”时, 名词用双音节比单音节好. 比如, 李宁定先生 (19 90) 注意到下面一类例子

- | | | |
|-----|-------|-------|
| (4) | 敌人的进攻 | 坏人的欺骗 |
| | *敌人的攻 | *坏人的骗 |

另一个现象是, 如果名词有两个不带“的”的修饰语, 而一个修饰语是单音节, 另一个是双音节时, 双音节的修饰语最好放在 前面. 这类例子, 也有人注意到过 (如吕叔湘 1979). 比如, (5b) 比 (5a) 更符合汉语的习惯.

- | | | | | |
|-----|----|------|-------|-------|
| (5) | a. | 北四川路 | 新汉语词典 | 大牛津词典 |
| | b. | 四川北路 | 汉语新词典 | 牛津大词典 |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 双音节词的产生和使用, 恐怕不光是因为同音词太多, 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Lu and Duanmu (1991) 提出了一个解释.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 选用单音节还是双音节与重音有关. 在有重音的位置上, 用双音节比较好. 为什么是这样呢? 也许重音与长度有关. 有重音的地方往往读得长一点, 选用双音节词, 正好与这个倾向符合.

可是汉语到底有没有重音呢?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统一看法. 即使汉语有重音, 重音的位置又是怎样决定的呢? 这两个问题牵涉到语言的共性. 最近对重音的研究发现, 很多语言都有重音系统, 而且重音出现的位置往往很有规律. 简单说, 如果一个结构由中心词和辅助词构成, 在一般情况下, 重音是在辅助词上 (详见 Cinque 1993). 既然重音的规律这么一致, 汉语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呢?

我们先看看汉语的例子是否符合这个规律. (2) 是动宾结构, 动词是中心词, 宾语是辅助词, 重音应该在宾语上. [2 1] 是动词长宾语短, 所以不好. (3) 中辅助词在左边, 中心词在右边, 所以左边不应该短于右边, 因此 [1 2] 不好. (5) 的中心词也在右边, 左边两个都是辅助词. 哪个重呢? 这种情况一般作两步分析, 如下

(6) [北 [四川 路]]

首先，“四川”和“路”之间，“四川”是辅助词，该重。其次，“北”和“四川路”之间，“北”是“四川路”的辅助词，“北”更重。因此主重音是在第一个词上，第一个词用双音节比较好。

现在来看(4)。(4)的中心词是什么呢？以前一般都认为是“的”字后面的名词。可是近来的句法研究表明，并非实词才能是中心词，英语的“the”，汉语的“的”，“了”，都可以是中心词。如果(4)的中心词是“的”，那么“的”后的名词就不是中心词而是辅助词，是个重音位置，因此这里用双音节比较好。

最后再看一组例子。吕叔湘先生(1963, 13页)注意到，有不少单音节词可以当量词，也可以当量词后的名词。当量词后的名词时，加个“子”字比较好。当量词时，一般不加“子”比较好。所以，下面的(7a)比(7b)好，(8a)比(8b)好。

- (7) a. 一杯牛奶 b. 一杯子牛奶
(8) a. 一个杯子 b. 一个杯

从重音的角度看，这个现象很自然。在量词结构中，量词是中心词，不该重，所以用单音节比较好。量词后的名词是辅助词，该重，所以用双音节比较好。

吕叔湘先生(1963)所列举的大量双音节现象，都可以用重音规律解释。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讨论了。

以上的分析说明，重音规律可以推出什么地方用双音节比较好。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把重音的概念推得太广了？“重”音好象总应该读得重一点才名符其实，而汉语除了轻声字以外，一般情况下好象并不觉得有的字比别的字重多少。有没有其它的事实证明重音不一定非要重读呢？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重音的表现方式的确是多样的，有时是音强，有时是音长，有时是高调出现的位置，有时是元音的变化，等等。只要能体现重音的位置，各种方式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重音也许还有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划分变调域的界限。比如上海话两字以上常常变调。只要知道变调域的界限，就知道域内的调怎么变。可是变调域的界限怎么定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比如，Selkirk and Shen (1990)提出，上海话的变调域是词以上的单位。合成词算一个词，只构成一个域。请看下面的例子（变调域用括号表示）

- (9) a. (加里)(佛尼亚)
 b. (南加里)(佛尼亚) *(南加)(里佛)(尼亚)
 c. (加里)(佛尼亚人) (加里)(佛尼亚)(人)
 *(加里佛)(尼亚人) *(加里)(佛尼)(亚人)

(9a) 是一个词，但可以分成两个变调域。(9b) 是两个词，但“南”不能自成一域。如果(9b)是合成词，也应该只有一域，为什么(9b)是两域，而又不以词界划分呢？也许有节奏问题？我们知道两音节一组节奏最好，可是(9b)不能用[2 2 2]。也许[3 3]也是好节奏？可是(9c)既不能用[3 3]，也不能用[2 2 2]，只能用[2 4]或者[2 3 1]。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现在我们看看用重音怎么分析(详见 Duanmu 1993, 1995)。先简单谈一下重音理论(详见 Halle and Vergnaud 1987, Hayes 1994)。重音的基本单位，暂且叫“音步(foot)”。音步有三个要素，暂且叫“音拍”，“界”，“首”。下面是两个例子

- (10) x x
 a. (X X) b. (X X) X = 音拍, () = 界, x = 首.

首的位置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重音的位置。(10a)叫“左首”音步，因为首在左边。(10b)叫“右首”音步，因为首在右边。一般的音步有两个音拍，轻重交替。只有一个音拍的音步叫短音步，一般不好，往往并入别的音步(或加个音拍而变成长音步，这里不谈)。

一个多音节的词可以分成两音节一组的几个音步。例如

- (11) a. (波多)(尼哥)
 b. (加里)(佛尼亚)
 c. (捷克)(斯洛)(法克)

(11)中所分的音步与上海话的变调域是一致的。音节是单数时，末一音节并入前一音步，所以(11b)的第二音步有三个音节。(说话快时，多音节词也可只用一个音步，这里不谈。)

汉语词的音步是左首还是右首呢？由于双音节词有很多左重右轻的，却没有左轻右重的，汉语词的音步看来是左首。

现在看看(9a-c)的音步结构，分析如下。

- (12) a. x x
 (加里)(佛尼亚)
- b. x x x x x
 (南) (加里)(佛尼亚) ==> (南加里)(佛尼亚)
- c. x x x x x
 (加里)(佛尼亚)(人) --> (加里)(佛尼亚人)

(==> 表示必须变, --> 表示可以变, 见下文.)

(12a) 只有一词，如前所说，可建两个左首音步。(12b) 有两词，分别建音步。“南”建一音步，“加里佛尼亚”建两音步，共三音步。同样，(12c) 也建三音步。

音步建好后，一般要近行两项调整。一是看有没有短音步，有的话可以并入另一音步，也可以不并。二是看有没有“重音冲突”(stress clash)。重音冲突是指两个音步首出现在相邻的音节上。如有这种情况，一般要去掉一个音步首。由于首是音步的必要因素，无首的音步随之也得并入别的音步。

(12a) 没有短音步，也没有重音冲突，所以原音步不变。(12b) 的前两音节都是音步首，有重音冲突，必须去掉一首。一般说是去掉较弱的一首。这两首谁弱呢？前面说过，辅助词比中心词重。因为“南”是辅助词，比“加”重，所以得去掉“加”的重音。“加”的重音一去，第二音步无首，得归入第一音步，结果是 [3 3] 两音步。(12c) 没有重音冲突，却有一个短音步，可并可并不并。如果不并，就是 [2 3 1] 三音步。如果并，就是 [2 4] 两音步。

上面的例子说明，用重音分析上海话的变调域，十分简单明确。更复杂的结构也能同样分析，这里就不细说了（详见 Duanmu 1995）。

还可以看出，平常所说的节奏问题，其实也是重音问题。不过重音理论把话说得更清楚。调整短音步和重音冲突，其结果是达到轻重交替，也就是最佳的节奏。

再回到双音节的问题上来。我们看到，重音结构是一个普遍规律。双音节词的选用，要受到重音的影响。我们进一步问，双音节词的产生，会不会也在某种程度上受了重音的影响？换句话说，因为重音位置用双音节比较好，人们会不会因此而造出了一些双音节词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两种理论，“同音字论”和“重音论”。我们已

经看到，同音字论不能解释什么地方用双音节好，什么地方不用双音节好。下面看看别的证据。同音字论认为，汉语音节数多时，双音节词少，音节数少时，双音节词多。我们知道，广州话和厦门话的音节数比北京话多，那么广州话和厦门话的双音节词是不是比北京话少呢？虽然有人这么说（吕叔湘 1963, 21页），但没有看到具体统计，恐怕还不能肯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查一下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两种形式的词，单音节的形式是不是已经和别的字同音了。比如说普通话的“店”和“电”同音，也许因此而造出了“商店”，同时又造出个“电气”。“蒜”也许因为和“算”同音，所以就造了“大蒜”，再造个“计算”。可是“宠”不与别的字同音，为什么造出个“宠爱”呢？“筛”也不与别的字同音，为什么造出个“筛子”呢？这样的讨论也许有点简单化。严格讲，我们应该弄清楚一个双音节词是什么年代产生的，而且在当时这个年代，它的单音节词是不是和别的字同音。这样的工作可惜还没有人做过。

我们知到，同音词引起歧义的机会是有限的。比如，“算”和“蒜”同音，可是放到句子里以后，产生歧义的情况就很少。而且，在语音的变化上，同音词很少起什么作用，既不推动语音变化，也不妨碍语音变化。如果同音词会影响语音变化，汉语的音节数为什么会减少呢？

不能否认，现代汉语的音节数比古代汉语少，而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又比古代汉语多。可正如吕叔湘先生（1963，21页）指出，很多双音节词都是近百年增加的新词，而北方话的音节数在最近几百年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双音节词的增加，不能说是同音字的原因。

新词的确有很多双音节的(或多音节的)。这也不难理解。比如说人名，地名，物名，外语是多音节的，汉语一般也用多音节，古今中外多如此。又比如说“电视”这个词，英语本来就是两个语素 (tele-vision)，译成汉语用两个语素当然也很自然。要把“电视”译成一个字才难呢。每个汉字早有它的意义，而“电视”是个新东西，选哪个字好呢？再比如英语的 car 是个单音节，要是只译成“卡”或“咯”，就会莫名其妙，除非造个新字，比如“车”字旁再加个“卡”的声部。不造新字，在“卡”后加个“车”字，也是个好办法。这种情况，恐怕不能说是真正的双音节现象。“吉普”和“香槟”已经是双音节了，后面不也经常加个表义的“车”和“酒”吗？

周有光先生（1961，245页，引于吕叔湘 1963，13页）说，汉语双音节现象主要由节奏引起。这个说法比同音字论有道理。前面讲了，节奏实际上就是重音，因此节奏论就是重音论。重音论不仅能解释把单音节词补充成双音节的情况，还能解释把超过两音节的词缩减为双音节的情况，以及把双音节词变成单音节的情况。

重音和节奏问题，恐怕每个语言都有，而且恐怕自古就有。换句话说，不光现代汉语有双音节问题，古代汉语也应该有。要比较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双音节现象，不应该只看双音节词的数量多少。前面说了，现代汉语新词很多，而新词往往只能用双音节或多音节。更妥善的方法，也许是比较古汉语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两个形式的词在总词汇里所占的比例，以及现代汉语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两个形式的词在总词汇里所占的比例。这项工作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还谈不上古汉语双音节问题的全貌。不过，根据郭绍虞先生（1938）的研究，古代汉语有许多词的确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两种形式，其长短也是随着节奏而变化。这个事实说明，重音规律很可能从古到今都是一致的。

双音节和变调域表面上看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两者都能用重音规律来分析，恐怕不是偶然现象。如果我们强调不同语言的特性，认为有的语言有重音，有的语言可以没有重音，就很难会想到用重音来解释双音节和变调域问题。结果，不但双音节问题解释不好，变调域问题也解释不好。不但谈不上双音节问题和变调域问题的联系，也谈不上汉语和其它语在重音上的共性。如果

我们相信，人类语言一定有共性，就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当我们从一些语言中（特别是从不同的语言中）发现了某个规律以后，就会问，别的语言是不是也有这个规律呢？即使在别的语言中一下看不出，也要想一想这个规律是不是有其它的表现方式。当然，要找到一个普遍规律并不是简单的事儿。可是，我希望本文的例子能够说明，寻找语言的共性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完全是可能的。

中文参考资料

- 郭绍虞 1938.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 〈燕京学报〉 24.
李宁定 1990. 〈动词分类研究说略〉, 〈中国语文〉 4, 248-257.
陆丙甫 1989. 〈结构, 节奏, 松紧, 轻重在汉语中的相互作用〉, 〈汉语学习〉 3, 25-28.
吕叔湘 1963. 〈现代汉语双音节问题初探〉, 〈中国语文〉 1, 11-23.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北京商务印书馆.
周有光 1961. 〈文字改革概论〉, 文字改革出版社.

英文参考资料

- Cinque, Guglielmo. 1993.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 *Linguistic Inquiry* 24.2: 239-297.
- Duanmu, San. 1993. Rime length, stress, and association domai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1: 1-44.
- Duanmu, San. 1995. Metrical and tonal phonology of compounds in two Chinese dialects. *Language* 71.2: 225-259.
- Lu, Bingfu, and San Duanmu. 1991.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rhythm and syntax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North America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May 3-5, Ithaca.
- Halle, Morris, and Jean-Roger Vergnaud. 1987. *A Essay on Stres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yes, Bruce. 1994. *Metrical Stress Theory: Principles and Case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lkirk, Elizabeth, and Tong Shen. 1990. Prosodic domains in Shanghai Chinese. In *The Phonology-Syntax Connection*, ed. Sharon Inkelas and Draga Zec. CSLI monograp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313-337.